从离散到回归：《三城》中的“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书写

黄秀国*
山东大学翻译学院

摘要

陈政欣小说集《荡漾水乡》（2013）中的短篇《三城》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为核心关切，深入呈现了跨地域、跨文化语境中海外华人个体与集体经验生成的复杂性。本文以“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为分析框架，考察小说中离散华人因代际迁移与多重离散而日益疏离于祖籍地中国、又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重返故土的人生轨迹。研究发现：长期的代际迁移与空间离散导致海外华人与祖先故土的情感纽带逐渐松弛，构成了“去中国化”的深层动力；而改革开放后年轻华人商人重返中国的“再离散”历程，则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商业理性与欲望逻辑可能加剧精神世界的荒芜；另一方面，这一重返过程本身亦可能成为文化身份“再中国化”的催化剂。小说由此揭示了“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海外华人在离散与回归的往复中持续协商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马华文学、陈政欣、《三城》、文化身份、再离散

* 黄秀国，现为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电邮：hjane985618@sdu.edu.cn

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2 (2026)

From Diaspora to Return: Negotiating Chineseness in Tan Cheng Sin's "San Cheng"

Huang Xiuguo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an Cheng Sin's short story "San Cheng" ("Three Cities") from *Dangyang Shuixiang* (*The Rippling Water Village*, 2013) centers on th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flicts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bing the complex gene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cross borders and cultures. This article adopts "de-Sinicization" and "re-Sinicization"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trace the cultural trajectory of diasporic Chinese who,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and multiple dispersals,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estranged from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only to return to China ami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1978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longed spatial dispersion has gradually loosened the emotional bond with the ancestral land, constituting the deep dynamic of "de-Sinicization"; meanwhil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merchants' return to China—a process of "re-diaspora"—reveals a dual orientation: on one hand, commercial rationality and the logic of desire may exacerbate spiritual desolation; on the other, this very return may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the cultural "re-Sinicization" of their identities. The novel thus demonstrates that de-Sinicization and re-Sinicization are not linearly sequential but a dynamically negotiated process within the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an Cheng Sin, "San Cheng", cultural identity, re-diaspora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使得传统上固定在某一国界或者区域内的资本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迅速汇拢到成本的低洼地。“恰好从这时起，即从 1978 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在时间上高度重合（郑必坚，2018）。这一机遇使中国迅速嵌入全球产业链，并成长为 “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资本、技术与人员的跨国流动空前活跃，中国吸引了大量包括早年移居海外的离散华人及其后代在内的全球商业力量。他们中也不乏有“打着流着中华的血脉的旗帜，口口声声说是要回来中国寻根探祖，就是想藉着那张中国人的脸孔来捞一些好处或便宜”的人（陈政欣，2013，页 28）。在此过程中，他们作为海外华人的复杂的身份认同中的中国性与异域特性也被再审视、再确认。一方面这些华人藉由中文、中华文化与华族的共同生理样貌确定其华人身份，另一方面又通过其跨文化的背景确定其华裔的国际身份。这些已经在各个国家落地生根的离散华人的后代，往往经历过多重离散。他们的先辈或因生活，或因战乱，或因政治，远离中国而后与中国隔绝数十年或上百年。作为年轻一代的他们又顺着全球化的潮流，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重新踏上被祖先抛弃的土地经历另一种形式离散。通过聚焦这些人物的经历，《荡漾水乡》 “以自身马来西亚的本土经验看待、审视中国，书写一系列海外华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生活遭际”，详细剖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在“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浪潮中的沉浮（许涵，2021，页 63）。

陈政欣，祖籍广东普宁，生于马来西亚威省的大山脚（陈政欣称之为“武吉”）。陈政欣在很多方面，例如诗歌、小说、评论、翻译和戏剧等颇有成绩。陈政欣早年曾经以经商为主，而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后，也主要描写商场中的人物命运的沉浮，特别是华人与华裔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商场上的搏击。陈政欣短篇小说集《荡漾水乡》中的代表性的作品《三城》通过混血主人公林先生等为代表的华裔商人在中国大陆的商业探索，刻画了全球化背景下华裔文化身份的变迁与协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了第二人称“你”的叙事视角，强化了叙事代入感，使读者直面角色在商业浪潮中的挣扎与反思。如评论家李有成所言，《荡漾水乡》重点描写的是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土地上的商机与欲望，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呈现为一个“精神荒芜、灵魂虚无的空洞世界”，因此该作品成为了“改革开放症候群”的描摹与再现。

这种再现视角似乎是对前行代作家如温瑞安和李永平等人强调的“文化乡愁”与中华历史作为避难所的思想倾向的一种纠正。《荡漾水乡》的文学价值与文学性成就或许还有商榷之处，但是作为数不多的以当下中国为背景的海外华文作品，它在华人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说《三城》中的“再中国化”同时也是“再离散”。这一悖论的出现，不仅因为小说中刻画的商业中国拒绝或者无法提供文化安顿，更因为小说采用的第二人称叙事机制本身就在叙事学层面模拟了这一悖论：读者被强制代入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对话中，只能处于一个无法固定的位置，从而能够直接体验到离散主体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困境。《三城》创新性地采用了第二人称叙事。借助这种以“对话性”与“强制

性”为特点的叙事视角，读者被强制代入叙事场景，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模糊了虚构世界与现实的界限，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创造出了极大的张力与共鸣。读者不得不紧随叙述者的视角审视华人的海外流散经历，以及他们再次流散回故土的过程中心灵上的矛盾与挣扎。这一形式与内容的同构，使《三城》成为马华文学从“文化乡愁”向“商业离散”范式转移的标志性文本。中国在《荡漾水乡》中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竞逐的舞台，在其中逐利与追求欲望的满足似乎主导了一切。《荡漾水乡》展现的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争相演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商人，例如跨国公司中的印度美女姬丝汀娜，马来西亚华裔沈京明，从悉尼被派到中国的“你”和其他澳洲同事，以及其他来自印尼的华侨商人与马来西亚商人等，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幅当代中国商场的众生相。

既有研究对《荡漾水乡》的解读主要分两种路径。李有成（2000）将其定位为“改革开放症候群”的再现，强调中国作为资本空间的荒芜感。许涵（2021）与朱崇科、洪翠婷（2019）则聚焦身份维度，认为主人公经历了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再到“超越中国性”的流动过程，但其“高度世界化的预设结果却很难彻底实现”（朱崇科、洪翠婷，2019，页 163）。上述研究为本论题提供了基础，但既有研究的共同盲区在于隐含一种线性进阶预设，未能充分解释《三城》中“回归即再离散”的悖论结构。本文以陈政欣《荡漾水乡》中的《三城》为例，从“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的视角重点分析这些离散华人的身份认同的流动性，聚焦离散华人以商人身份“回归”中国时，为何“再中国化”预示着新的疏离？这些离散的华人，一方面渴望通过商业纽带重连故土或者借助其文化杂糅的背景在故土获得商业成功；另一方面又在与祖先的故土文化碰撞中遭遇了新的文化冲击。本文认为，《三城》中的“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在商业全球化语境下形成了一种悖论性共存。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第二人称“你”的叙事机制的对话性，考察小说如何在美学层面上模拟并强化了这一悖论。通过这一分析，本文试图说明，《三城》拒绝了“离愁——回归——安顿”的线性叙事，将离散身份呈现为全球化语境中不可消解的流动性状态，从而为马华文学中的“文化乡愁”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在讨论《三城》中的身份变迁之前，首先需对马华文学研究中常用的“中国性”与“中华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等概念进行说明。既有研究对“中国性”与“中华性”的界定与理解并未完全统一。部分学者，例如黄锦树等认为“中国性”本身是权宜性称谓，亦可译为“中华性”，强调文化想象（黄锦树，1998）。也有学者，如陈庆妃等则认为两个术语应作清晰的层次划分，他们强调“中国性”指马华文学在民族国家层面体现的身份意识、国家观念与价值取向，“中华性”指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身份的归属与认同（陈庆妃，2023）。本文选择不严格区分“中国性”与“中华性”，而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中国性”指代离散主体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情感与认知联系。这并非忽视二者在学理上的差异，而是基于以下考量：从文本层面看，《三城》的主人公“你”作为澳籍华裔，“你”的困境纯粹是文化感知层面的。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国籍选择、政治立场或国家忠诚的

叙事线索，因此“中国性”与“中华性”的区分失去了文本基础。所以，在本文中“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并非指放弃或者重新获取中国国籍等政治行为，而是借鉴朱崇科（2014）关于“本土中国性”的讨论与胡淼森（2008）关于“去中国化”话语建构的分析，特指海外华人在情感与认知意义上与中华文化的疏离与再接触。

一、海外华人文化身份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区分了两种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把文化身份理解为基于共同历史经验与共享文化符码的、稳定而连续的意义框架；第二种则强调身份没有固定的本质，而是在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持续作用下不断“生成中”。霍尔本人倾向于后者，并提出文化身份“不是本质，而是定位”（Hall, 1990, p. 223）。霍尔的论述揭示了文化身份的动态本质，但就海外华人的具体情形而言，需强调文化身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既表现出持久的稳定性，又具有因环境变迁而重构的可能性。首先，文化身份往往具有稳定性。作为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信念、符号与实践的集合，它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归属感与意义感。与此同时，文化身份又具有变化的可能性——它会因环境变迁或利益的考量，通过被动适应或主动调适而发生改变。具体到东南亚的华人历史而言，在流散背景或地区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许多海外华人个体或群体试图淡化、剥离或替换其身份认同中与中国相关的文化符号、语言习俗及价值观念，以适应当地社会、应对政治压力或建构新的认同，这一过程即“去中国化”。胡淼森将这种文化身份的调整概括为“对于自身的身份有所疑惧，希望通过脱离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母体影响这一主观行为来明晰自己的主体”（胡淼森，2008，页 25）。这一概括在《三城》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小说中“你”的“去中国化”正是源自父辈身份疑惧的代际影响。

主人公“你”作为澳洲华人的后代，父亲是华人，母亲是爱尔兰人，父母在澳洲结婚定居。“你”成长于澳洲，接受纯英语教育，在语言与日常生活层面都已经完全融入澳洲社会。然而，比语言文化的同化影响更大的是父母对各自母国经历与文化联系的主动切断。因为父母经历的创伤，他们遂对过往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中性缺席，而是一种情感遗产的代际传递（Hirsch, 2012）。叙述者在成长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近乎无知，对爱尔兰的认知也极为片段化。更关键的是，这种沉默并非中性的，在其中叙述者继承了父辈对中国的疏离与排斥，从而在接触前便已对中国形成了负面的情感预设。对于中国，你好奇的只是，曾经“你的父亲的父亲跟他的故乡乃至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留下那么深沉仇恨，以至让你的父亲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远走澳大利亚，并从那时起就把中国推出视界外？”（陈政欣，2013，页 20）。祖父的仇恨将中国“推出视界外”，但“根”却以一张相片的形式顽固地留存，“相片里是一个载着小圆帽留辫子眼眸凹陷瘦削的老人”沿着山路走出来的地方，但他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抑或是情感上，对于中国是疏离的态度（陈政欣，2013，页 18）。不同于众多华人作家笔下海外华人对中国的

纯粹留恋与思念，《三城》的主人公虽然意识到根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在语言、文化与情感上对中国均持疏离态度。这种疏离不是无知造成的空白，而是被父辈的创伤叙事影响的结果——它构成了“你”后来“再中国化”遭遇的前提。

然而，小说将“你”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归因为个体创伤与情感选择的结果，这一叙事策略虽具文学感染力，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去中国化”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作为文学文本，这一选择本身无可厚非——它提供了身份困境的感性结构。但值得追问的是，这一个人化叙事是否遮蔽了其他可能的解释路径？历史社会学论述作为参照框架，可以与小说的个人化叙事形成对话，以呈现“去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文学想象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固然，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政治运动给归侨带来身心伤害，从而导致他们产生情感抵触而自愿“去中国化”的情况在少数华人身上或许真实存在。但海外华人史的研究表明，海外华人身份转变，往往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国籍法与在地政治压力作用下的结构性结果，而非单纯个人选择（王赓武，1994）。小说选择将这一命题个人化、情感化处理，与历史现实中的结构性逻辑形成对照。以陈政欣所在的马来西亚为例：独立以前，当地中国移民并不存在“华侨”“华人”“华裔”等概念的区分，他们全部是侨居于此、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因此不存在“去中国化”现象。这些侨居海外的中国移民因为看重身份中的中国因素、认同中华文化，对在地文化与政治并不热衷——这一历史选择为后来华人在所在国政治上的被边缘化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之间的错位关系埋下了伏笔（陈志明，2005）。

这一“错位”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迅速激化。随着殖民统治终结与民族国家建构启动，新政权往往推行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同化政策，华人等少数族裔的族裔属性被夸大。例如，随着马来西亚独立，马来西亚土人权力的提升，同时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氛围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致使当地华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文化都迅速地被边缘化，甚至在 1969 年爆发了激烈排华运动如 5.13 事件。这一事件成为马华族群的集体的历史创伤。此后，为了“要在所在国立足，他们（海外华人）必须去接受或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饶芃子，2000，页 3）。他们被迫舍弃或者隐藏自己的族裔属性以求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中。这是“去中国化”的外在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会认为外部压力有时也会增强族性。例如对于一些华人作家而言，“遭受种族、政治歧视的个人记忆……加上路途遥远的地域距离，都强化着华人作家对精神故园的依恋”，此类华语作家的作品可能因此具有更加典型的中国元素（黄万华，2000，页 222）。但这种属于特例，对于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而言“去中国化”从而消弭种族特性往往是优先选择。简而言之，《三城》中“你”的“去中国化”看似是个体对父辈创伤的继承，实则是从殖民时期到后独立时代、从双重国籍政策到本土化压力的历史演变的结果。

这种结构性压力在《三城》中“你”的家庭里首先表现为对汉语的放弃，对中国过往记忆的缄默。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在汉语的象形文字中

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主体意识”，“你”没有受过中文教育，不懂中文，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均不了解，自然谈不上亲近感或认同感（饶芃子，2000，页 3）。在“你”的家庭中，父辈的中国经历成为了禁忌，刻意地被忽视。“那个有辫子的老人就是你父亲的父亲，你父亲从来没有向你提起过他的父亲，好像那是不可触摸的禁忌。你父亲也从不教导或鼓励你学习华语，而且似乎有意让你忘记血液里的华人基因”（陈政欣，2013，页 20）。这种远离华语的态度，表面看是情感选择，实则往往是因为英文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前景与经济回报（王赓武，1994）。这一逻辑在冷战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全球华人移民中普遍存在。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后来的反转，当中国经济崛起后，汉语教育重新成为实用选择。小说中只接受过英语教育的“你”只能“通过英文书籍来认识中国历史。在那些英文的字里行间，你总感觉到一种疏离感，一种语言上的隔阂”（陈政欣，2013，页 34）。当“你”因为华人的长相被路人用汉语搭讪的时候，脱口而出的“No Chinese”因此具有多重意涵。它可以被解读为“我不是中国人”（拒绝政治归属），或者“我不懂汉语”（拒绝语言期待），或者“不要和我说汉语”（拒绝文化召唤），或者三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哪种解读，“你”对中国或中文的拒斥都是非常明显的。这句简短的英文，浓缩了一个已完成去中国化的个体在面对“中国性”时的抵触姿态。

语言的放弃意味着切断了与中国文化的通道，而更深层的“去中国化”则表现为情感的疏离与漠然。《三城》着墨较多的是“你”的父辈们对那个“选择背弃和逃离的中国……悲惨古老血腥的中国”的怨怼（陈政欣，2013，页 20）。因祖辈在中国的遭遇而对“中国”情感淡漠甚至反感，不仅是“你”的个体经验，也是小说中那位印尼华人（父亲华裔、母亲爪哇人）的处境。这位印尼峇峇（土生华人）的祖父和父亲在海外淘金后在中国建国之初回到故乡，却在后来的运动中遭受迫害。“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的家人曾经在这块大地上流过血，有过深恶痛绝的恩怨，并且是充满着愤恨逃难而去的。”（陈政欣，2013，页 26）。时隔多年，他拒绝与这段“血泪的过去”和解，试图彻底切断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联系。他在回到印尼之后要“研究爪哇的历史与文化，我要遁隐于我的母亲（一位爪哇女子）的血脉里”（陈政欣，2013，页 27）。由此，这位印尼华人陷入了“去中国化”的认同困境。为达成与中华性的彻底剥离，他试图隐没于母系的爪哇血脉之中，因为他知道他的父系血脉始终与华夏渊源紧密相连。然而，他的这一“去中国化”的选择恰恰暴露了其困境——他试图隐没于母系爪哇血脉之中，因为父系血脉与华夏渊源紧密相连，但是父系血统是与生俱来的，无法被母系选择所覆盖。因此，他的“去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表演。这恰恰证明，当“去中国化”被推向极致时，它反而暴露了自身的不可能性。在《三城》中，“你”的去中国化虽没有如此极端的表演，但其情感结构与此同源——父辈的创伤叙事已在“你”身上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在接到公司调令、即将赴华之际，“你”反应显得颇为平淡，并未流露过多欣喜。因为“中国对你来说并不能代表什么，反而是让你有抵触的苦涩”（陈政欣，2013，页 19）。

当这些华人后裔再度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们在语言、情感乃至身份认同层面均已呈现出显著的“去中国化”特征。陈政欣的此类书写，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前行代”作家（指 1950-1970 年代的华人文人及早期移民作家）对中国“原乡”的构建之间，构成了鲜明差异。那些早期作家具有深刻的被迫离开中国的离散经验与侨民意识，对他们而言中国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具体的、物质的、可感的物理空间与情感归宿。他们的作品往往大量保留闽粤家族伦理、地方神明信仰与文化习俗，蕴含着“落叶归根”的强烈愿望，体现了明确的身份意识与家国观念（陈志明，2005）。但是《三城》所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去中国化”完成后的主体状态，这构成了第二部分“再中国化”的叙事前提。

二、“再中国化”的未完成性

然而，“去中国化”并非终点。当“你”真正进入中国的场域时，这一看似完成的文化身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逆转——这便是“再中国化”的过程。与“去中国化”相反，“再中国化”是指在全球化与跨国主义语境下，个体或群体（特别是海外华人或曾经历“去中国化”过程的社群）通过主动的文化寻回、语言复兴、价值重估以及社会实践，重新建立或强化与中华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及当代中国的联系，对已建构的身份进行调整。这一过程并非回到本质化的“中国性”，而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新激活与中华文化的联系（Ong, 1999）。《三城》中的主人公“你”就经过三城的工作经历之后，完成了这种身份认同的动态调整。“你”被公司总部从澳大利亚派驻上海三年之后，又接连被派往沈阳与西安，即小说题目中的“三城”。在与中国这个现实中的国家以及这里现实中的人们接触的期间，“你”对中国的感情，从疏离、漠然到逐渐向对中国的认同靠拢。“你愿意靠近、审察、考究与欣赏中国的文化与习俗。”（陈政欣，2013，页 52）。这种转变“一言以蔽之，其实是再汉化的过程”，即“再中国化”的过程（李有成，2000，页 11）。通过三城的生活经历，主人公“你”从对中国的不了解甚至抗拒走向逐步接受、喜爱。与印尼老人、苏珊娜、梅芬间的对比，则凸显出主人公“由接受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身份认同的过程”（许涵，2021，页 64）。换言之，“你”的终点不是回到某个“本质化”的中国，而是构建了一个既能理解中国、又同时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主体身份。

而这一重新激活的过程，首先借助汉语语言能力的重新获得。如果说“去中国化”是从语言的丧失与华文教育的缺失开始，那么“再中国化”也是从汉语的习得开始，从不会说汉语变得能直接阅读中文的中国近代史与小说。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选择了汉语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身份。这对于海外华文作家如此，对于普通的海外华人亦是如此。小说通过“你”与华裔商人 CS.陈的对比，揭示了语言教育的决定性影响。二者皆置身于离散与杂交的文化语境之中，差异主要在于 CS.陈是成长于马来西亚的“峇峇”社群，而“你”则是在澳大利亚的欧亚混杂环境中确立了身份认同。然而，由于 CS.陈长期浸润于华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背景不仅

塑造其认知结构与情感倾向，亦使“中国”与“中国文化”在其身份叙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而在比较视野中彰显出教育路径对离散主体文化认同的形塑力量。华文教育在CS.陈内心中深藏着华人伦理观念与与“那种恋根溯源的情结”（陈政欣，2013，页 38）。尽管他的名字中仅保留着一个华人姓氏，但是他的中国内核仍然很牢固。他的内心中有对家族血缘根深蒂固的坚持与追溯，而这种对家族与血缘的坚持是中国情节的象征之一，是“华人保持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途径”（许涵，2021，页 62）。陈的寻根之旅凸显了其身份认同中的中华性。他视祖先墓地所在的乡土为情感原乡，坚信父母埋骨处即为子女之乡。依此逻辑，他个人的故乡当在马来西亚（父母安葬之地），而家族血脉的源头则指向中国。在陈的身上，华文教育不仅成为文化认同的媒介，更内化为一种指向中华性的认知与情感框架。这一认知框架决定了其与“你”同赴乡间的寻根之旅中看到截然不同的情景。在“你”的眼中，那片土地是与父辈记忆相重合的“脏乱差”乡村景象；而同一片土地，在陈的眼里却是凝聚历史纵深与未来希望的文化土壤。

其次，“再中国化”还表现为情感上从对中国的怨怼转变为认同与“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与先人故土与自我身份中的中国性的和解。尽管在乡间寻根时，“你”看到的仍是与父辈记忆相重合的“脏乱差”景象，但正是这种遭遇使“你”开始理解那段历史。“你”发现“你的父亲和你的父亲的父亲留给你的对‘中国’的抵触感，经过两年的淘洗磨砺，已不是那么显著了。你是感觉到你在逐渐地向中国靠拢……”（陈政欣，2013，页 30）。当然这个过程里，主人公的内心中不乏矛盾与挣扎，例如感觉到对父亲的背叛，对出生地澳洲的背叛。但是正如“你”所认为的，与其说这是一种背叛，不如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认识。“你”站在了一个更为宽敞的平台，“那个留着辫子的老人的时代逐渐清晰起来，那个时代所累积的仇恨与苦难终于都有了解释和饶恕的可能”（陈政欣，2013，页 50）。“再中国化”在此表现为一种对失落的过去的再连接。在“去中国化”中被压制与尘封的中国情感，重新踏上这片的鲜活的土地时被重新激活。哪怕有汉语教育的缺失，有对中国的情感排斥，海外华人与华裔仍有其他的文化身份认同途径，例如家庭教育中对于家族历史的追溯。正如小说中的印尼华侨所言，“几十年来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再三重复的有关我的辈们的故事叙述的源头，他们能有这种缅怀故人的心意”（陈政欣，2013，页 25）。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再次流散回祖先之地的华裔商人认同的是当下的、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城》的描写呈现的是两个中国，一个现代、时髦、光彩熠熠的中国，另一个是导致许多人移民国外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而让华裔商人产生归属感的恰恰是这个现代的中国。”（Paoliello, 2010, p. 121）。让这些华裔重新熟悉与认同的是“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粼粼发亮（的）……另一个国度的中国”（陈政欣，2013，页 20）。换言之，他们的“再中国化”不是回到父辈的苦难中国，而是认同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希望的中国，而这是“再中国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真实表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指的“再中国化”并非本质化的文化归属，而更像是对中国高速现代化发展的认可的一种功能性认同。但本文认为，在《三城》的叙事逻辑中对

现代中国的功能性认可构成了“再中国化”的入口，它松动了“你”原有的情感抵触，为后续的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性的皈依提供了前提。因此，本文使用“再中国化”时，指的是这一从功能性认可到文化重连的渐进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现代中国的认同并非“再中国化”的终点。在《三城》的结尾，“你”承认你愿意接近、了解、欣赏中国文化，但是仍然觉得国籍、故乡此类概念都是虚无缥缈的，并计划前往俄罗斯开拓业务。这表明主人公“在实地认识、体验、 感受中国后，做出了接受中国文化并超越中国文化的决定，试图以多元融合的、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性超越单纯的中国性”（许涵，2021，页 64）。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商人，任何地方只要能提供最舒适的生活与环境，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当“你”来到西安后，“你”立刻做了一个计划，“你”要去俄罗斯开拓业务。“你”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一年内，你要学会俄罗斯语。俄罗斯会迅速再度兴起西伯利亚是块宽阔无际的大地。”（陈政欣，2013，页 57）。初读之下，这一转向似乎与前文的“再中国化”内容不一致，甚至有论者可能认为结尾突兀。正如朱崇科与洪翠婷（2019）在分析陈政欣的创作时指出的，“陈政欣以澳洲华裔的再中华化过程为中心更多是提出了问题，并缕述其华化过程，但其高度世界化的预设结果却很难彻底实现”（朱崇科、洪翠婷，2019，页 163）。因此，这一选择不宜简单读解为“超越中国性的世界公民”，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商业资本逻辑下的流动选择。但这一选择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呈现了“再中国化”的边界性：即使主人公重新建立了与中华文化的部分连接，这种连接也可能不足以构成本质化的身份归属，因为全球化商业流动随时可以将其推向新的方向。这种描写恰恰说明了“再中国化”的流动性与可协商性。文化认同并非既定本质，而是霍尔所说的“永远在生产之中”,一直在不断的演变（Hall, 1990）。“再中国化”的“你”“更愿意成为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而不是让一些国界来囚困。你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工作”（陈政欣，2013，页 52）。这种“再中国化”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一人物的身份的杂糅性的体现。混血主角的设定强化了身份认同的撕裂感——华裔父亲与爱尔兰裔母亲的血统交织，华人的外貌与内在文化认知的错位，折射出离散群体对中华文化复杂态度。因此，“再中国化”在《三城》中最终指向的是通过中国走向世界，这既是全球化时代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现实处境，也是陈政欣对“中国性”问题的思考。

三、结语

正如饶芃子所指出的，“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所形成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由于文化身份各别，作品也无不深深打上‘身份’的烙印”（饶芃子，2000，页 2）。本文以陈政欣《荡漾水乡》中的《三城》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中离散华人的文化身份中的 “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的动态过程。本文所说的“离散”，并非经典离散论述中被迫迁徙

与集体创伤的模式，而是指《三城》主人公“你”所处的商业离散处境。这一处境是跨国资本流动而非政治迁徙造成的，其位移逻辑是商业性的，但位移后果却是文化性的。“你”因家族创伤与语言丧失而对“中国”产生情感抵触，经历了“去中国化”。与中国的这种疏离在重返中国的“再离散”过程中进一步激化，一方面表现为商业理性与经济逐利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荒芜，另一方面，在真正进入中国商业场域后，汉语习得、家族记忆和解与对现代中国的功能性认可又松动了这一抵触，从而在情感与认知上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再中国化”。然而，这一文化重连并不彻底。“你”的混血身份与跨文化成长背景，使“你”的认同始终处于霍尔（Hall, 1990）所说的“永远在生产之中”的状态。而这种未完成性正是离散主体在商业全球化中的身份特征之一，即永远在归属与疏离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这也正是《三城》体现出的马华离散书写从“文化乡愁”向“商业离散”范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标志。

参考文献

陈庆妃（2023，6 月 15 日）。马华文学如何书写南洋华人记忆？*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6/01-06/10547165.shtml

陈政欣（2013）。《荡漾水乡》。有人出版社。

陈志明（2005）。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 37-52）。华社研究中心。

胡淼森（2008）。“去中国化”：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与衍变。*贵州社会科学*，（10），25-32。

黄锦树（1998）。《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元尊文化。

黄万华（2000）。从美华文学看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载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编），《期望超越——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究会论文集》（页 221-225）。花城出版社。

李有成（2013）。改革开放症候群——读陈政欣的小说集《荡漾水乡》。载陈政欣，《荡漾水乡》（页 4-14）。有人出版社。

饶芃子（2000）。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载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编），《期望超越——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究会论文集》（页 1-4）。花城出版社。

王赓武（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

许涵（2021）。马华作家陈政欣的“交替复合式”中国书写。*美与时代（下）*，（7），61-65。

郑必坚（2018，5 月 9 日）。新时代中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人民日报*。

朱崇科（2014）。《“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

朱崇科、洪翠婷（2019）。论陈政欣作品中的马华性操练。*文艺争鸣*，（3），157-164。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awrence & Wishart.

Hirsch, M. (2012).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oliello, A. (2010).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quest for identity in *Hun de zhui su*, a Sinophone Malaysian short story. *Facta Universitatis*, *8*(2), 115–124.